

特首掛帥做好「一帶一路」這篇大文章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王國強

特首梁振英早前接受新華社專訪時透露，政府考慮設立專門機構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發展。「一帶一路」由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提出，通過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貫通亞洲、歐洲、中東和非洲60多個國家和地區，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五通」。「一帶一路」將為國家發展提供龐大機遇，香港擁有「一國兩制」優勢，享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先機，更應有所作為，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鑑於「一帶一路」計劃龐大，涉及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多邊事務，涉及香港多個政策局的協調，除了設立一個專門機構負責推動之外，更應由特首親自掛帥，主持工作，以落實其「超級聯繫人」的思路。這不但有利各項配套政策的落實，更可體現出香港的高度重视，全力做好「一帶一路」這篇大文章，為香港經濟注入動力，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

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宏偉藍圖構思，藉着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促進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一帶一路」涉及60多個國家和地區，涵蓋區域廣闊，是一個劃時代的偉大構想，不單可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帶來了基建、金融、商貿等巨大商機，更將深化各國的交流協作，共同打造和平合作的新型國際秩序。

「一帶一路」是香港的大機遇

「一帶一路」不單是國家的大戰略，而且是香港的

大機遇。香港擁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較其他國家或地區更能用好國家的大機遇。香港的物流、工商專業服務和金融業，在國際上擁有強勁的競爭力，可以為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提供金融及專業服務的支援。同時，香港是亞洲最大的資產管理中心，管理資產超過二萬億美元。香港也是全球最具規模的離岸人民幣中心，人民幣資金池規模超過一萬億人民幣。這些資金可以協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融資，成為「一帶一路」的重要後勤基地。

對香港自身發展來說，在「後改政」時期，聚焦經濟

發展民生已是全社會的共識。但令人憂慮的是，近年香港經濟轉型緩慢，產業結構過分單一，偏重金融、地產的產業單一化問題至今未有解決。近期連旅遊業也因為激進派人士騷擾內地客，以及人民幣貶值等不利因素夾擊而大受影響。香港經濟隨時出現逆轉。在這種嚴峻形勢之下，香港更需要積極投入「一帶一路」的建設中，既是利用自身的優勢服務於國家大戰略，也是為香港的長遠發展開拓新的經濟點，尋找新的發展機遇。

梁振英在新華社的訪問中提到，在「一帶一路」方面，不僅香港在行動，新加坡也在行動，而且新加坡在東盟國家方面還更有優勢。梁振英透露，特區政府正在考慮以合適的方式，包括評估設立專門機構，配合國家發展「一帶一路」。除了政府部門之外，香港的半官方機構，比如貿易發展局、旅遊發展局，也在考慮怎麼一起「走出去」。確實，不少國家都看準「一帶一路」的商機，期望能夠從中分一杯羹。香港不能守株待兔，必須主動出擊，把握好「一帶一路」機遇。當中最重要的是擺脫一直以來「積極不干預」的掣肘，在大機遇面前做到有所作為。例如「一帶一路」涉及大量的資源投放，如果特區政府囿於積極不干預思維，不願意作出投資，不主動引導產業發展，不擔當「推動者」的角色，儘管龐大機遇放在面前，本港也難以得益。因此，特區政府應以更加積極有為的思維投入「一帶一路」建設。設立高規格、專門的

機構負責統籌，絕對有必要。

有所作為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同時，鑑於「一帶一路」建設的複雜性，特首身為特區之首，理應親自掛帥推動，原因是「一帶一路」涉及大量的資源投放、政策配套以及對外關係，並且涉及不同政策局的協調。由特首主持其事，可以較好地協調不同政府部門，令政策能夠更快捷、順暢地推行。同時，由特首主導其事可顯示香港對於「一帶一路」發展的重視，加上梁振英一直主張香港要扮演好內地與世界接軌的「超級聯繫人」角色，一針見血地點出了香港在「一帶一路」的角色和位置。因此，由特首主導「一帶一路」，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

不過，近年香港好事多磨，不少有利經濟民生的政策措施，都無一不受到政治干擾，甚至向低收入人士發放的津貼都被反對派在立法會拉布。香港發展最大癥結，正正在於政治惡鬥不斷，內耗不止，反對派為了政治目的罔顧香港發展和港人的利益。現在香港最需要的是全心全意投入「一帶一路」建設之中，各界更應防止反對派再次拖香港後腿，讓各界可以集中精力智慧，做好「一帶一路」這篇大文章，讓香港重拾競爭力，切實改善民生。如果反對派繼續逆民意而行橫加阻撓，必將在選舉中付出沉重的代價。

戴耀廷是披着學者外衣的「政治特工」

梁立人

頂天立地

有自稱於「佔中」期間協助處理財務問題的「小人物」爆料指稱，戴耀廷共收了民主發展網絡總值778,658元的支票。民主發展網絡正是西方反華勢力進行顏色革命的「彈藥庫」，是「佔中」的幕後黑手，事實證明，戴耀廷收人錢財，替人辦事，披着學者外衣，卻淨做反中亂港，顛覆政府的勾當，可謂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特工」。香港大學對此毫無感覺，而且還有意無意的為他護航，可謂荒天下之大謬。港大要維持學術的純潔，保住港大的校譽，該是清理門戶的時候了！

香港大學「秘密捐款」的「黑金」問題懸而未決，自稱於「佔中」期間協助處理財務問題的「小人物」爆料指稱，戴耀廷亦一直收取民主發展網絡的錢。在2013年9月至2014年10月的13個月內，共收了15張總值778,658元的支票。

民主發展網絡是反華勢力的「彈藥庫」

所謂民主發展網絡，是朱耀明做主席的政治山頭，於2002年成立，秘書是盧偉明，司庫是鄧偉棕。這三人分別是牧師、社工和律師，都不是會生金蛋的鵝，但是，民主發展網絡卻有花不完的錢，很明顯，民主發展網絡的靠山並非民主而是金主，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恨，為什麼有人會無條件地把大把大把的錢送給民主發展網絡呢？很明顯，民主發展網絡是西方反華勢力進行顏色革命的「彈藥庫」，明白了這點，就知道民主發展網絡是什麼來頭，「佔中」是什麼性質，戴耀廷所扮演的角色更是一目了然。

戴耀廷恃着有雄厚的靠山，當教授或許只是他的兼職，所以他一直都不把港大放在眼裡，曾公開宣言：「鬼佬校長唔識中文，副校長唔識政治，做了再算。」事實上，他名為教授，但卻可以一連幾個月不用上課，全職搞「佔中」，港大不聞不問，從來沒有作出任何干預。此外，他們出手闊綽，一擲千金毫不吝嗇。去年7月1日的「佔中」預演，租文華酒店房間監控指揮；「佔領」行動爆發，租萬豪酒店房間監控金鐘主場；民

主發展網絡還曾用幾十萬元買「最先進」的音響和通訊器材供「佔中」行動所用。戴耀廷除了親自衝鋒陷陣，還直接寫支票給港大，利用港大的資源為「佔中」造勢。香港大學審核委員會也證實，另外有一筆錢是戴交給陳文敏經手。陳文敏做了什麼？香港大學管理層沒有過問？也根本沒有人說得清楚。

如果說，民主發展網絡的捐款是為了香港發展民主，他們可以大大方方的公開捐款的目的和金錢的來源，香港大學也應該將其用途向公眾作清楚交代。可是，民主發展網絡的行為鬼鬼祟祟，香港大學在處理捐款時含糊糊糊，戴耀廷更是欺上瞞下，膽大妄為，令人對他們的意圖產生懷疑。事實說明，民主發展網絡正是「佔中」的幕後黑手，香港大學已被利用為顏色革命的大本營，戴耀廷是披着學者外衣的「政治特工」。

戴耀廷收錢亂港 證據確鑿

或許有人認為筆者所言太過武斷，但在諸多鐵證面前，實在不能不令人產生合理懷疑，相反，如果要證明戴耀廷清白無辜，反而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首先，香港傳媒曾獲得的一份機密報告，顯示「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NDI）早在2006年已在港為推動「佔中」作準備，並於2007年啟動青年公共參與計劃。2012年NDI動用46萬美元，用作推動香港學生參與政治，項目包括：資助港大法律學院「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CCPL），成立「港人講普選」網上平台

等，而戴耀廷正是CCPL的主要成員之一。第二，戴耀廷在2013年初到正式發起「佔中」以來，一直和英國、德國、加拿大、澳洲、日本等國的駐港領事人員頻頻會面，討論香港政治情況及「佔中」進展。僅去年一年內就四度見英領事，有兩次還是英領事緊急約見，戴更是馬上安排，隨約隨見。第三，戴耀廷搞「佔中」活動的黑金來歷不明，所謂捐款途徑十分曲折，首先由「熱心人士」（已證實是壹傳媒的黎智英）捐給民主發展網絡，再由朱耀明寫支票給戴耀廷，戴耀廷又以無名氏名義捐給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陳文敏再轉交給鍾庭耀，若再追溯黎智英的捐款來源，則更為複雜，若戴耀廷單純追求民主，又何必裝神弄鬼，以無名氏的名義欺騙世人呢？

戴耀廷披着港大教授的外衣，做的是反中亂港，顛覆政府的勾當，令人遺憾的是，香港大學對此毫無感覺，而且還有意無意地為他護航，可謂荒天下之大謬。其實，民主發展網絡開出的五張支票都不是匿名本票，目的明顯是為支援「佔中」，難道香港大學沒長眼睛？不知道民主發展網絡就是「佔中」的幕後搞手嗎？難道他們對肥佬黎公開和外國反華勢力勾結一無所知？如果有恐怖分子對港大捐贈，要求港大合作進行聖戰造勢宣傳，港大收不收？做不做？會不會對資金來源有所懷疑呢？抑或港大甘願做「佔中」大本營，讓港大學生成為「顏色革命」的炮灰呢？

香港大學是香港的最高學府，關係到香港的聲譽和未來發展，不應成為藏污納垢之地，更不能被人利用作反中亂港的橋頭堡，港大負責人在這問題上隻眼開隻眼閉，到底盡了責任沒有呢？要維持學術的純潔，保住港大的校譽，該是清理門戶的時候了！



■梁立人

誰才是干預港大事件的幕後黑手？

彭靖雅

港大衝擊校委會事件仍是全城討論焦點，政客不斷在此挑撥，渾水中找魚，在此，筆者想從簡單的角度出發，看看問題。

衝擊者「身份特殊」可獲「厚待」？

首先，事件當天走的是正常開會流程，然而，衝擊人士的出現，擾亂了現場的秩序，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當天現場有3種人，一是衝擊者（主動者），二是受衝擊者影響的人（被動者），三是當時當刻目擊事發經過的目擊者（包括職員、記者等等），衝擊者中的大學生多是已過18歲的成人，其中有份參與的政客，更有不少是專業人士，他們不只沒有阻止學生失去理性的衝擊行為，更任由事件惡化，這是負責任的行為？這是成熟理性者的應有舉措？衝擊者有什麼理由支持其犯罪行為？難道「大學生」這重身份可以特別優待犯罪衝擊行為？那麼，是否衝擊發生的地點只要屬大學校園範圍，參與衝擊者的身份是學生，是年輕人，就可以受此「厚待」？作為法治文明社會，甚至是議事廳的一員，你們也曾是天子門生，請們自問，

孩子的不懂事，資深政客成年人為什麼不發聲？

「無證據」的文字力量

今年2月劉進圖在《明報》撰文指「一些極具影響力的政府人士更親自致電若干港大校務委員，要求他們否決遴選委員會成員一致推薦陳文敏任副校長的建議」，此文一出，迴響極大，「消息」受反對派政客熱捧，紛紛引以為據，誰知資料來源未有證實，傳言順勢托出「干預」的指控，至於劉文是否有真憑實據，早已在聲討港大校委之聲中掩蓋，假傳聞，真傷害，藉此「流料」衝擊，陳文敏的「受害人」角色成型。

劉氏撰文在此發功之力，確實可圈可點。今年6月，劉氏又在《明報》刊發題為《給梁智鴻的公開信》的文章，強調「副校長任命不能再拖」；今年7月，劉氏再撰《權謀鬥爭取代循規管治》又進一步指稱「以李國章、梁智鴻為首的親建制校委絞盡腦汁，想出了一條計策，就是委託一位重量級中間人遊說陳文敏，希望陳文敏同意收到任命通知後馬上請辭」。然而，

傳媒人應該都知道，如有新聞線索，就應先追蹤求證才可下筆，捕風捉影的穿鑿附會，只是個人揣測之詞，當中會否有偏見偏差？其中會否牽涉未查先判式的打壓和干預？

報道正確反遭非議？

反觀《文匯報》早前有關陳文敏處理捐款不當的報道，已獲港大審核委員會證實，港大審核委員會直指陳文敏處理捐款的手法「未達預期標準」，但當時仍有不少陳氏支持者抨擊這些報道，為陳氏「抱不平」，特別是當陳文敏從不肯證明中間人是誰，再到電台節目《香港家書》中指自己「不能讓步」，又進一步以「寒蟬效應」來演繹事件，作為旁觀者，確實感慨此番劇情層次豐富，極具張力；然而，事實就是事實，對一個人的支持不應該失去對真相與事實的認知，大家回歸客觀思考：事情發展到今天，假如劉氏所發表的文章，其中所作出的指控都非事實，那麼這些被傳媒炮製出來的所謂「干預」、「打壓」的最大得益者是誰，而其中一直積極干預港大事件的幕後黑手又是誰？大家不妨再細心思量。

對天津大爆炸暴露出的嚴重問題須馬上整改

文正言

習近平主席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將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設定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第五個現代化，這也是當前中國變革的方向。天津大爆炸事件，正是反映出第五個現代化必須加快推行，必須本着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高度負責的態度，真正吸取這次爆炸的慘痛教訓，對所暴露出來的諸多問題馬上整改，並將政府的治理機制逐漸由「粗放型管理機制」向「精密型治理機制」轉變，以更好地適應改革步入「深水區」所面臨複雜多變的現實情況。

天津「8·12」大爆炸事故發生後，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國務院連派工作組前往指導救援和事故處理。習近平主席指出，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以及近期一些地方接二連三發生的重大安全生產事故，再次暴露安全生產領域的突出問題，血的教訓極其深刻，必須牢牢记取，堅決遏制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發生。李克強總理指出，事故涉及的失職瀆職和違法違章行為，要徹查追責，給歷史一個交代。

大爆炸顯示治理體系和能力的滯後

中國正在快速發展的快車道上，躋身世界經濟強國後，取得了許多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天津大爆炸就是表徵之一。習近平主席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將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設定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第五個現代化，這也是當前中國變革的方向。習近平主席去年在參加兩會上海團審議，談到特大型城市社會治理時也強調：「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而天津大爆炸暴露的，恰好是治理水準和體系的滯後。

根據中國化學品安全協會公佈的事故資訊，2011至2013年我國共發生危險化學品事故569起，累計死亡638人，其中58%死於危險品爆炸。事實上，1993年深圳就發生過一起嚴重的危險品倉庫爆炸，事故共造成15人死亡，200多人受傷，重新審視22年前的那次爆炸，就會發現諸如違規存放危險物品，倉庫人員不經安全培訓等情形，和天津大爆炸何其相似。回顧每一次安全事故，相當程度上是治理體系和能力滯後所造成，令許多早已暴露出來的老問題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

堵塞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的疏忽和漏洞

在工商註冊資訊中，瑞海國際是一家民營企業，這家公司業務只限於普通貨物的倉儲。但這樣一家本應該只經營普通倉儲業務的企業，卻被指定為天津口岸危險品貨物集裝箱業務的大型中轉、集散中心，是天津海事局指定危險貨物監裝場站和天津交委港口危險貨物作業許可單位。

根據國務院頒佈的《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設立存儲危險化學品的企業，必須向省一級的經濟貿易管理部門和市級安監部門提出申請，由這兩個單位組織專家進行審查，然後頒發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但在國家安監總局2012年頒佈的《危險化學品經營管理辦法》規定中寫道：依法取得港口經營許可證的港口經營人在港區內從事危險化學品倉儲經營的，不需要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瑞海國際確實擁有港口經營許可證。國家安監局的規定，顯然是忽略了資格與安全兩個重要條件，這些巨大疏忽和漏洞，必須立即加以堵塞。

條塊分割管理體制呈現弊端

天津港實行以天津市領導為主，中央交通部領導為輔的管理體制，這種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人為地割裂了港口與城市的內在聯繫，出現了種種弊端。就瑞海國際所在的天津濱海新區規劃來說，一方面，濱海新區天津港定位是中國北方最大的石化產品儲運和集散基地；另一方面，在天津市的規劃中，濱海新區同時被定位為「宜居的生態城區」。這樣兩個定位明顯存在矛盾和衝突，暴露缺乏統籌佈局和統一治理，是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缺位。另外，就是瑞海國際堆場安全距離超標，距離爆炸現場最近的社區只有600米，違反必須執行1000米距離的紅線規定。這個問題在全國多個地區都有存在，我們再也不能漠視這種情況的存在了，應盡快採取果斷措施予以整改。

當然，客觀上說，如何防止發生涉及危險化學品的重大事故，這在西方發達國家也有一個逐漸完善的過程，近年來西方國家類似的重大事故也是一再發生，例如，2001年9月，法國西南部工業城市圖盧茲化工廠AZF發生強烈爆炸，事故造成31人死亡和2500人受傷。2013年4月17日，美國德克薩斯州化肥廠發生爆炸，造成至少10棟建築物起火，35人死亡，超過160人受傷。但是，這些都不是推卸責任的理由，最重要的是，要本着對人民生命安全高度負責的態度，真正吸取用巨大代價換來的慘痛教訓，對已經暴露出來的嚴重問題，要痛下決心，立即舉措行動。管理體制不完善的，要盡快協調理順；法律法規不完善的，要馬上按照法定程序補充修訂；危險品存儲倉庫不符合標準的，要馬上整改；有關管理和操作人員不符合上崗規範的，要馬上培訓；總之，要以該事件為突破口，全面提高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治理能力。同時，要建立對有關官員在安全問題上「一票否決」的機制，做到警鐘長鳴，確保安全防範工作能夠真正落實到政府工作的每一個環節之中。